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在探索的路上

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

宋代的婚姻礼仪

汉赋的铺张扬厉

轿子史话

近年来楚辞研究概述

张鸿勋

方志远

朱瑞熙

龚克昌

黄新宇

寿勤泽

12

1988





医药学院610 2 01472137

文史知识

1988年第12期

(总第90期)

• 治学之道 • 在探索的路上	张鸿勋	3
• 文学史百题 • 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	方志远	9
• 历史百题 • 太平天国同外国的关系和对外国的认识	王庆成	15
• 怎样读 • 阴幼遇的《韵府群玉》	谢先模	24
诗 { 论证剀切 发人深省——读《朋党论》	洪本健	27
文 { 天涯旅人的情思曲——析冯去非《所思》	李 敏	30
欣 { 语语纤巧 字字妍倩——析蒋捷《一剪梅·舟过吴江》	崔子恩	32
赏 { 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百首选三)赏析	胡铁军	34
• 古代科技漫话(19) •		
我国古代计时器和近世的机械钟	陈尔俊	36
文化史知识 { 古殿堂上话藻井	高林生	41
唐代的“送穷”习俗	刘桂秋	
宋代的婚姻礼仪	朱瑞熙	
清宫的朝会仪式	王 凌	51
文史书目 { 一部记载上古中朝日文化关系史的文献		
问答 { ——《新撰姓氏录》介绍	徐桐生	54
人物春秋 { 马援的苦酒是怎样酿成的	刘易修	57
最大限度实现了人生价值的张衡	刘周堂	61
明朝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刘瑾	廖心一	66
• 史学家小传 • 郑樵的治学精神及其史学成就	范兆琪	71
孔子和孟子	钟肇鹏	76
我国的累世同居之家	宋昌斌	80
汉赋的铺张扬厉	龚克昌	84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马礼逊与英华书院	史静寰	88
• 中国名著在国外 • 《史记》在日本	覃启勋	93
• 青年园地 • 借男女离合之情 抒国家兴亡之感 ——浅谈梁辰鱼的《浣纱记》	刘 斌	97
• 读书札记 • “传奇”之“传”的读音	星 汉	101
• 文史信息 • 《周易》中的经济思想(79) 《易经》在西方的传播(104) 建文帝和燕王的个人因素与“靖难之役”结局的关系(104) 对晚清小说的新评价(105)		
• 文史信箱 • 轿子史话	黄新宇	106
文史 } 今过葬王地 重忆建安人——鱼山曹植墓巡礼	吴济夫	110
古迹 } “四世宫保”砖石牌坊	孙继清	112
• 文史研究动态 • 近年来楚辞研究概述	寿勤泽	113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谁是武当山内家拳技的创始人	李大东	119
《文史知识》1988 年总目		120
• 补白10则 • 用人(23) 一壶浪得士二人(40) 恃才傲物者戒(42) 何谓死而不朽(53) “管中窥豹”和“管中窥虎”(56) 阳昼赠言(83) 遗之以清白(92) 晏子辞高缭(100) 民之口不可壅(109) 袁子才箴友(117)		
乘輿、抬轿(封二) “四世宫保”砖石牌坊(封三)		

在探索的路上

张鸿勋



张鸿勋，河南郑州人。1935年生，1959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现任天水师范专科学校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理事。主要论著有《试谈〈金瓶梅〉的作者、时代、取材》、《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类型初探》、《谈敦煌本〈启颜录〉》、《〈孔子项托相问书〉传承研究》及《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等。

大学毕业以后，除“大革文化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我一直做教师，就是现在也仍旧没有脱离教学工作。但教学之外，我主要的兴趣即在敦煌文学的探讨和研究之中。这几年，因为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文，于是时而有人问我是怎样走上这条研究道路的，如何研究敦煌文学，等等。的确，近几年来，“敦煌文学”一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些研究者的书面或口头，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虽然也有人认为它的概念尚可推敲，但由于它通俗、概括化，因而被应用得越来越普遍。我最早接触它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我比较喜欢宋元话本小说，曾用很多精力搜集材料，准备编写一部“宋元话本小说叙录”之类的东西，拟将现存的几部话本和拟话本集，如“清平山堂话本”、“京本通俗小说”、“三言”、“二拍”等，逐篇考索诸家之著录、版本之异同、编写之时代、体制之特点、故事之衍变、于后世小说戏曲之影响等等。正是在对宋元话本小说的追源溯流中，我越来越感到，与欧洲小说发展道路不同，我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形成、发展和民族风格，深深受到说唱文学的巨大影响。过去研究中国说唱文学的发展历史，一般只追溯到宋代，更早的情况却由于史料缺乏而难作进一步探究。

可是本世纪初重显于世的敦煌遗书中，却发现了一批唐五代时期流行于寺院和民间的各类说唱作品，如变文、话本、讲经文、词文、因缘……，正好填补唐代传奇小说与宋元以来话本、诸宫调、宝卷、弹词、戏曲之间的巨大空白，为其发展找到了中间环节，理出了承上启下、继承创新的衔接关系。这些作品在说唱文学史和小说发展史上，有着特殊地位和价值。不仅如此，当我进一步接触到敦煌遗书中其他一些文学作品时，如王梵志诗、曲子词、俚曲小调……，真如进入宝山，满目琳琅，美不胜收。过去我国文学史上某些长期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如词的起源、长调慢词的产生、白话诗的发展等等，从中都可以找到某种答案。于是，敦煌文学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从此我就专注于这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了。

研究敦煌文学，首先就遇到看作品难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在本世纪初重见天日后，其菁华几乎全被劫盗出国。现分别收藏在巴黎、伦敦、列宁格勒等地，已属各国特藏，要去查看，自非一般人所能做到。虽然，英法等国已将其所藏制成缩微胶片，我国几个重要的图书资料中心多有收藏，但普通读者要想使用，也不太方便。就是可以看到，也会因这些卷子除少部分完好无缺外，大多受千百年自然侵蚀或人为毁坏，往往是缺头少尾，或头尾俱失，或仅存片断；加之或一篇未终又改抄他篇，或信手学书涂抹改窜，俗体别字，鲁鱼亥豕，比比皆是，乍一接触这些材料，真有不知从何入手之感。好在其中部分卷子，包括文学作品的卷子，已经一些学者整理刊布，可供初学者阅读，如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向达等的《敦煌变文集》，以至近年出版的《王梵志诗校辑》、《敦煌歌辞总编》、《敦煌文学作品选》等，都不难寻求。虽然这些整理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瑕不掩瑜，是可以用它们为基础，对敦煌文学进行某些考察和研究的。

从事敦煌文学研究，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与可能，治学范围与需要，选择不同的方法和途径。可以整理遗书，搜残补缺，考订存佚；也可以录文校勘，诠释词句；还可以应用这些材料论证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语言、社会风俗等方面的问题，不能拘于一

格。由于我偏处西北一隅，远离学术资料中心，看卷子、查资料都很困难，要直接阅读遗书（那怕是缩微胶片），极为不易。于是研究的重点，就放在我较熟悉的说唱文学上了。在探讨和研究过程中，我深深感到，敦煌文学既然是一种文学现象，那它就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有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研究敦煌文学，不应当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总的文学思潮。敦煌文学，既不是“前不见古人”突兀自来的某种特异的東西，也不是“茕茕孑立”四无依傍、仅仅限于“敦煌”一地的作品。它同样是根植于中华沃土的一种文学。只是由于某种原因，集中保藏在敦煌莫高窟内而已。所以，敦煌文学的形成、发展，作品形式、产生历史背景等等，与内地中原文学没有什么本质差异，它们都是从同一生活土壤、历史文化背景哺育出来的文学。其中的诗、表、疏、书、启、论、说、记、传、赞、录、颂、铭、状、牒、碑……不用说，都是传统的古文学体类，在任何一部古文选中都可以找到相同形式之作，就是研究者公认为敦煌文学中最具特色的变文、讲经文等，据唐人郭湜《高力士外传》、胡璩《谭宾录》、赵璘《因话录》、孟棻《本事诗》、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以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等有关记述看，当时长安、洛阳、四川、苏州等地也曾普遍流传，只是中原内地传唱的作品都已失传，仅在敦煌偶然被保存下来而已。所谓敦煌变文，实际上就代表了整个唐五代时期的说唱文学。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必须将敦煌文学现象放到整体中国文学的大背景下进行宏观观照，才好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必须先具有较坚实的中国文学史方面的知识，才能得心应手地利用敦煌文学材料，从事研究。

当然，这并不是说敦煌文学就没有自己的个性。敦煌文学与同时代的其他文学，如中原文学，有共同的一面，又有不同的一面。研究敦煌文学，应该也可以与通常研究中原文学的观察侧面、层次有所不同。敦煌文学作品，内容丰富，类型多样，除传统的文学作品外，其中尤具特色的是通俗文学作品。也就是唐五代时期在敦煌地区流行、表现普通民众的生活、思想、愿望与要求，而且大多采用群众喜闻乐见形式的诗文、曲子词、俚曲小调、说唱故事（变文、词文、话本、讲经文等）为主体的文学作品，以及当时当地文士的作品。这些作品的

作者，大多佚失，或虽有姓名却不见于现存任何史传；相当一部分作品传播的手段，要靠有一定声腔曲调的演唱活动，而且其中某些作品内容，至今仍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这说明，这部分作品具有某些民间文学特征。研究它们时，要用民间文学的观点去认识、分析，才能说明问题。同时，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建郡以来，至宋元对外贸易另辟海路之前，一直是联结中原与西域以至欧洲的交通枢纽。隋代裴矩《西域图记》对当时敦煌的重要性作过这样的概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自襟带。……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书》卷67）那时的敦煌，“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确为丝绸之路上的“华戎所交一都会”。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它与周边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如吐蕃、高昌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保持极其密切的关系。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虽以汉族文学为主体，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使其呈现出多民族性特点。他们各自在保持本民族文学特色的基础上，又有融合交流，相互影响，构成敦煌文学的多样性。再者，自从佛教传来以后，敦煌作为紧邻西域的门户，最先受到佛教影响，成为我国早期佛教中心之一。《魏书·释老志》就记载，敦煌“村坞相属，多有塔寺”；举世闻名的莫高窟，就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竺法护、竺法乘、竺佛念、释宝云等著名佛学家，都曾在敦煌从事译经。至唐代，敦煌的佛教达到极盛，当时曾有人这样形容它：“莫歟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佛教深入到当时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形成灿烂的敦煌佛教艺术，敦煌文学写卷，也都出自佛教寺院“藏经洞”这个特殊书库中。因而敦煌文学中有大量释徒之作，如禅诗、鸣钟诗、燃灯文、发愿文、功德记、礼佛赞、灵验记等等，自是宗教作品；《太子五更转》、《悉昙颂》、《散花乐》、《好住娘》等等，则是僧侣利用通俗文艺形式编唱的宗教文学；变文、讲经文、因缘、押座文等等，或直演佛经，或受佛家思想潜移默化，就连其散韵夹用、说唱结合的形式，也深受佛教文学散偈相间的影响；至于许多作品那种光怪陆离、变幻诡异的铺染和不加藻饰、平易朴实

的口语化文风，与佛教译经文体的启迪，都分不开。

有了这样的理解和认识，在探讨和研究敦煌文学作品时，就会使我们比较容易把握住它的主流，深入其中，发现问题。如敦煌遗书中有关13个汉文写卷《孔子项托相问书》，50年代初，法国学者苏远鸣(M. Somie)又发现了3个古藏文写卷《孔子项托相问答》，并作了研究。此后，这一问题再无新的论述。1983年我得到一册新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五册，看到标有“龙朔二年”(662)字样的两个残片，被拟名为《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话杂抄》。经对勘，其文字绝大部分竟与敦煌本《孔子项托相问书》相同，而抄写时间却又较后者早二百多年，显系同一作品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流传的异本。同时，我又在《历代文学艺术家的传说》第二册上看到河北省民间故事《拜师》，讲的也是这个故事，台湾歌仔唱本又有《孔子项橐论歌》、《孔子小儿答歌》仍在流传，就是传统相声《蛤蟆鼓儿》，其反复诘答的手法和部分内容，也能看出《孔子项托相问书》的影子，于是我就写成了《〈孔子项托相问书〉故事传承研究》(见《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1期)，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明长期流传在汉族地区的项橐(俗作“托”)七岁为孔子师的故事，其影响已达高昌、吐蕃等地；而且《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话杂抄》的发现，使我们有了较《降魔变文》早数十年的说唱作品，就不能不考虑过去某些权威论断，如故事赋“都是变文的支流”，是在“变文已趋衰微”后才兴起等，恐怕是站不住脚了。应该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故事流变的探讨，有了些微进步。又如，敦煌故事赋中有一篇《茶酒论》，大约是中唐至五代间的作品。它以拟人化的茶与酒争辩哪个价值最大，哪个最有益于人类，反映了唐代饮茶风尚普及后社会上引起的一场争论。可是我在《民间文学》1983年第7期上读到一篇流传在贵州布依族间的寓言《茶和酒》，其内容、结构、表现手法等，与《茶酒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接着，我又在《西藏研究》汉文版1984年第2期上读到次仁班觉的《浅谈〈茶酒夸功〉及近代俗人文学》一文，他介绍了产生于17世纪的一篇藏族寓言《茶酒夸功》。尽管文中他没有涉及《茶酒论》，可是我立刻感到它们之间可能会有某种关系，于是我就注意翻查唐王朝与吐蕃、南诏(唐代的贵州属南诏)等民族政权的关系

史，看到安史之乱后有70多年吐蕃曾直接统辖过敦煌，其势力且远达西州（今吐鲁番地区）；而南诏和唐同吐蕃也来往很密，唐文化同吐蕃文化对于南诏的影响也很深，这早已为向达《南诏史略论》所论证，因此它们之间的文学交流，也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汉族的《茶酒论》、藏族的《茶酒夸功》、布依族的《茶和酒》时代虽有早晚，地域有南有北，但主要情节、思想寓意，甚至散韵组合的文体等，会有那么多共同处。从纵向考虑，我发现以拟人化矛盾双方各自“夸功”来“争高”、“争大”的故事，民间还有很多。远在公元前3世纪，《韩非子·说林下》有一则“两口之𧄸”的寓言，可说是目前所见此类故事最早的一个。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着译经也传来了古印度寓言，给中国的小说，输入了新鲜血液。后秦鸠摩罗什译、比丘道略集的《杂譬喻经》第25有一则“头尾争大”（又见尊者僧伽斯那撰、求那毗地译《百喻经》下卷），也是这一类型的故事。而“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难怪唐代会产生出《茶酒论》这样的作品。流风所及，绵延不绝，宋有“眉眼争强”（《新雕文酒清话》卷六），明嘉靖间有笑话“口脚相争”、“眉争高下”（乐天大笑生纂集《解悃编》卷三、六）、话本《梅杏争春》，万历、天启间有《花鸟争奇》、《山水争奇》、《茶酒争奇》等七种“争奇”小说（竹溪散人邓志谟编），笑话“茶酒争高”、“技艺争高下”（墨憨斋主人编《广笑府》卷八），民国间扬州清曲有《竹木相争》，以至1987年春节晚会上马季等五人表演的群口相声《五官争功》，都是这一类型的故事。在这样纵向和横向考察的基础上，我写成了《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故事》（见《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

这两篇作品的探讨和研究使我悟出，研究敦煌文学除了从古文书角度进行考校外，还应该把视野再扩大一些。不能仅仅盯着卷子和作品本身，还要注意掌握一些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学情况，尽可能地搜集尚流布人口的活资料，加以比较，这样才能较全面地认识敦煌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当然，研究敦煌文学也还需要一定的文献目录学、文字学、训诂学、考古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了。

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

· 文学史百题 ·

方志远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像两颗夺目的亮星，升起在明初文坛，被文史学家们视为明清小说的重大成就。但是，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问世以后，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断裂时期。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除了瞿佑的《剪灯新语》和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屈指可数的传奇短篇集外，没有产生过一部有影响的小说。而到嘉靖以后，却涌现出以《西游记》、《封神演义》、《金瓶梅》及“三言”、“二拍”为代表的一大批长篇小说和短篇白话小说集，令人目不暇接。然而，这样一个小说创作的黄金时代却被又一次的改朝换代所中断，直至18世纪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才以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曲折故事，打破了小说史上的沉寂，它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犹如三个巨浪，将明清小说的创作推到高峰。但明清小说的真正繁荣期，却出现在晚清。据阿英先生估计，这一时期翻译和创作的成册小说不下一千种，但无论在思想深度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却没有能与《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相匹者。明清小说创作的大起大落，客观上反映了明清社会的一波三折。

严格地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并非明初社会的产物，而是宋元市民文学发展的结果。关于三国的故事，唐季五代以来即在民间广为流传，是宋元话本杂剧的重要创作源泉。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关于三国的话本小说《全相三国志话本》，流行在元代至正年间，虽然内容比较简单，文字稍嫌拙朴，但罗本《三国演义》的主要情节，已在这里出现。同样，《水浒传》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宋元间成书的《大宋宣和遗事》也已备载。罗贯中、施耐庵正是在继承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创作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

据《武林旧事》所载，南宋著名的“说话人”，说小说者有52人，

说史事者有 23 人，说佛事者有 17 人。世情、历史、神魔，实为宋元话本的三大内容，而在明初成为长篇的只有反映历史题材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其流行也并不在明初，而是在嘉靖、万历时期；至于大量反映市井平民日常生活以及谈鬼说怪的作品，直到明中叶以后才渐次被挖掘出来。这就不能不使我们考虑：明前期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学史、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究竟处于何种地位？

明朝建立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保护小农业生产的政治经济政策，使从唐中叶以来渐趋解体的小农经济重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成为明初极端君主专制的基础。在明初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制度下，社会思想遭到禁锢，商品经济受到摧残，宋元时期发展起来的市民文学，也被扼杀。明初严峻的政治形势，并不具备小说创作的社会条件。尽管元末明初波澜壮阔的政治风云和宋元时期市民文学的发展惯性的相互作用，仍然造就出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不朽历史小说，但这也是产生于明初极端君主专制尚未来得及发生作用以前；至于世情小说和神魔小说，则被扫除一空。政治上的净化带来了小说创作的净化。

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趋于活跃，明初极端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经济一统化政策，以及由此导致的严峻政治形势，开始出现缓解。社会风气也由“敦厚俭朴”转向“浮薄华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终于从嘉靖开始出现小说创作的高潮。与明初不同，嘉靖以后的小说是以世情、神魔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为主流。可以说，宋元的话本小说，是明中后期小说的文学源头；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则是它的生活源泉。

在民间流传的唐僧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宋元之际已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问世，元末流行的《西游记平话》，进一步增加了取经故事的神话色彩，人物形象也更加丰满，成为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重要材料来源。冯梦龙的著名短篇白话小说集“三言”中的不少篇目，录自宋元话本小说，即由冯梦龙自己创作者，也多以宋元话本故事为引子。被认为我国第一部单独由文人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也仍取《水浒传》故事中的一节为全书的开端。这些小说无论在语言文字上还是内

容编排上，均跨越明前期而直承宋元。

在明中后期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这样一幅画图：商业发达，城市繁荣，官、商合流，金钱万能，社会道德堕落，官场风气腐败。这几乎是明中后期社会的写照。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正德以前被称为“风尚诚朴”，而嘉靖以后，则“风俗自淳而趋于薄也，犹江河走下，而不可返也”。明前期，吏治整肃，官员致仕，惟恐有人言其重利，而至嘉、万时期，为官惟以取财为能，稍清廉者，被人讥讽。

在嘉靖、万历的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作者对社会现状的矛盾心理。他们既赞美青年男女的自由婚恋，又痛惜封建道德风尚的堕落；既主张消除士、商间的社会差别，又希望封建纲常的重振；企图通过小说来规劝人们放弃对金钱的追逐，回到原有的道德规范中去。冯梦龙在这一问题上具有代表性。在“三言”中，有大量关于男女青年冲破封建礼教，大胆追求爱情的动人故事，但几乎每个故事，又安排了金榜题名、夫贵妻荣的大团圆结局。在《一文钱小隙造奇冤》这样不很著名的短篇中，冯梦龙对明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和社会风尚作了真实的叙述，但得出的结论则是“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又回归到旧的社会观念之中去了。

小说家的矛盾心理，反映了明中后期普遍的社会观念。人们既反对明初那样的高压统治，又不满于嘉万时期封建法制的废弛；既热衷于对财富的追逐，又对因商品经济的冲击而日渐颓废的社会风气表示担忧；既希望有一定的思想、活动自由，又担心社会发展方向的失控。社会观念的矛盾，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明中后期，尽管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在一些先进的手工业部门出现了稀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阶层逐渐形成并开始有了自己的经济要求，但是，这些发展和要求在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和稳固的政治经济一元化体制面前，又显得那样的微弱。商品经济不但不具备改造乃至统驭自然经济、解体一元化政治经济体制的力量，却因城市经济的畸形繁荣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道德的过速堕落而引起从下到上的普遍憎恶，因而在一次新的改朝换代中被政治权力碾得粉碎。以商品经济和城市繁荣为基础的小说创作，又一次进入低潮。

清朝的建立以及封建君主专制的再度强化，既是明清之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对明中后期封建法制松弛和封建道德堕落的反动。从民族意识来说，清朝的入主中原是一次“华夷之变”；从阶级意识来说，清朝推行的强权政治又代表着中国社会的领导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要求；从社会意识来说，清初对城市经济的摧毁和对小农经济的扶植，则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愿望。从一定意义来说，清初社会是跳跃了明中后期而直承明初，自然经济重新得到稳定，君主专制重新得到强化。直到康熙晚期，商品经济和市民意识才又开始复苏，但却以比明中后期缓慢得多的速度发展。小说创作的又一次高潮也伴随而来。

在艺术手法和思想深度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似乎自然地形成三个阶梯。《聊斋志异》以一个个独立的花妖狐魅的短篇故事，从表层揭露清朝政治的溃疡；《儒林外史》却是以一条主线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串成长篇小说，来剖析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社会基础——封建知识分子，进而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举制度；《红楼梦》则是以几个上层贵族家庭的兴衰荣辱和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瓜葛为线索，来揭示封建社会的内部矛盾。

如果我们将明中后期的《金瓶梅》、《西游记》及“三言”、“二拍”等与清康熙乾隆时期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加以比较，就可以发现，前者的格调是轻松的，轻松中带有几分戏谑；后者的格调是严肃的，严肃中带有几分悲感。

两个时期小说的不同特点，反映了两个时期不同的政治气候。明朝自成化始，皇帝已不经常过问政事，至万历，神宗三十年不上朝，诸司奏启留中不发，大臣离职不闻不问，都察院八年不配正官，诏狱遍地长满青草，封建法制近于废弛，整个国家机器几乎凭借惯性运转。而清朝康熙乾隆时期，正是封建法制重建并趋向稳固、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时期，连续不断的文字狱和文化专制政策，驱赶着文人儒士埋头古籍，直至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尚心有余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全为稻粱谋。”正如傅衣凌先生所说：“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是

以新的因素往往中断、夭折。”(《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较之明中后期,清前期的封建政治制度不是衰落了,而是强化了,封建经济结构不是松散了,而是稳固了。因而,明中后期的小说是嘻笑怒骂,无所顾忌,康雍乾时期的小说则是假语村言,言而未尽。

两个时期小说的不同特点,又反映了小说家社会责任感的升华。笑笑生、冯梦龙等嘉、万时期的作家,多用嘲弄的笔调来揭露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的男盗女娼者,一吐为快。甚至对一些腐朽生活细节津津乐道。较少考虑社会效果,所反映的,也往往是某种社会现象,而缺乏对整个社会的批判。吴敬梓、曹雪芹等雍乾时期的作家则力图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示清代社会的全貌、表达作者自身的济世主张,行文下笔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腐败现象的痛心疾首。

许多小说评论家和历史学家认为,《红楼梦》、《儒林外史》等小说从不同角度揭露和抨击了封建制度的罪恶,反映了作者对新生活的追求,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不少学者又认为,这些小说还反映了封建制度的濒于崩溃和走向灭亡,表现了封建社会的世界观原则和准绳的彻底破产,则未免失之于过。

康雍乾时期,正是清朝最强盛的时期,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小说家,所能感受的是自身和家族的悲剧,很难设想他们能感受到清朝乃至封建社会的没落并在小说中反映出来。一方面是曹雪芹笔下的几个贵族家庭的衰败、吴敬梓笔下的科举制度的不合理,一方面却是另一些家族的兴起、更多的知识分子奔竞于科场。《红楼梦》等小说确实揭露了清代社会的腐朽,但腐朽并不等于灭亡,中国封建社会从确立时起,腐朽性就已开始暴露,同样,腐朽也不等于崩溃。人们指责高鹗违背了曹雪芹的原意,在续书中写了贾府的复兴。其实,高鹗的这一处理却使《红楼梦》更能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盛极而衰,衰而复兴,具有极强的自身调节力和稳定性。

人们往往只注意“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却很少考虑,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

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资本主义的猛烈撞击，这个发展过程将会有多长时期。在曹雪芹等人生活的康雍乾时期，还远没有形成使封建社会溃崩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小说家是不可能超越时代去反映这一社会的崩溃和灭亡的。

鸦片战争的爆发，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中国既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又无法迅速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而是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自然经济顽强地抵制着洋货的冲击，却又不可挽回地走向解体；城市仍是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但在外来资本的刺激下，经济上却呈现出畸形的繁荣；清王朝竭力维持祖宗旧制，压制一切新的思想，却无可奈何地走向衰亡。人民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上层社会进一步腐朽，民族自救意识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为实际行动。正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出现了小说创作的繁荣。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自救意识的加强，晚清小说创作以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为自然分界，形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三侠五义》、《彭公案》等侠义公案小说为主流，小说对社会的黑暗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揭露，但并没有跳出旧式侠义小说的窠臼。小说中的侠义人物，几乎无一例外的最终拜倒在清官脚下，为朝廷卖命，反映了生活在苦难之中的芸芸众生寄希望于清官、侠客的社会心理。后一阶段以《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老残游记》等谴责小说为主流，揭发弊恶，纠弹时政，举凡官僚制度的腐朽，官场作风的腐败，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地痞流氓的无耻，乃至民众的愚昧和社会风俗的落后，均在小说中得到反映。从这些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无所作为、濒于灭亡的王朝，一个陷入灭顶之灾的古老民族。但绝大多数小说的格调低沉，在伤感和愤慨之外，难以看到前途和力量，这客观上又反映了这样一个社会现状：尽管民族自救意识增强，但全民族的觉醒程度却极为有限，离爆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尚有相当的距离。辛亥革命的结局正说明了这一点。

晚清小说，主要是谴责小说所表现的一个明显倾向，是小说日益成为作家自觉地透视社会、批判社会的武器，小说家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强烈，这无疑是明清小说的一大进步。但也正因为

太平天国同

外国的关系

和对外国的

认识

王庆成

太平天国是基于怎样的观念同外国打交道并演出反侵略斗争的业绩的。

1853年4月27日，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刚一个多月，南京江面就来了一群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文翰及其随行人员乘“何默士”号兵舰来访。从此，太平天国历史又增添了对外关系的新篇章。

广义来说，太平天国的对外关系，除官方关系外，还包括同外国传教士的接触，一些外国人作为个人支持或反对太平天国的活动以及外国人与太平天国的贸易关系。本文只讨论官方性质的关系，分析

文翰同太平天国领导人交换了信件，他的翻译官密迪乐会见了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表明了英国将在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立场。半年多之后，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到南京访问，次年5月美国公使麦莲前往南京，都表示了类似的态度。6月，英国官员还再次到南京访问。

英、法、美三国外交官接踵访问太平天国，当然不是偶然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外国侵略者并不以从“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获得的利益为满足。他们企图通过“修约”，压迫清政府作更大的开放和让步。这时，一个新兴的巨大势力——太平天国突然出现在

作家在创作时以理性控制感情，使艺术性服从于实用性，故而小说无论在组织结构，还是塑造人物上，均显不足。晚清谴责小说数量甚多，却没有塑造出一个不朽的艺术形象，没有出现一部影响深远的巨著，不能说与此无关。明清小说与明清社会一样，至此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他们的重要据点上海附近，清朝的统治面临崩溃的危机。这使他们不得不对这个潜在的清政府替代者作一番调查了解，因而对它发生若干兴趣。英、法、美三国的共同态度是，在压迫清政府进行“修约”谈判的同时，向新势力表白自己不偏袒任何一方的中立立场，以保持主动；同时又向新势力表明他们从清政府获得的利益不容侵犯，英国外交官为此向太平天国当局递送了一份“南京条约”的抄本。

太平天国在三国使者来访时，表现出“傲慢和兄弟情谊的奇特混合”。一方面，他们本着宗教的立场，认为同拜上帝的外国人都是兄弟，称之为“洋兄弟”、“番弟”，对他们表现出热情和友善。在与外国人交谈中，最感兴趣的就是宗教问题，但他们的宗教与西方基督教并不都相同。据说洪秀全早年有各国和平相处、以礼相接的思想。但他起义后自称上帝之次子、耶稣之胞弟，系奉上帝之命下凡为天下万国之真主。这一教义和中国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相结合，使他们对外国的地位和外国人来访的意义产生误解，以为是来朝拜真主、向天朝进贡的。因而，他们对外国人除了因是“洋兄弟”而表示友善以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自大和傲慢。杨秀清给文翰的复文中称“尔海外英民，不远千里而来，归顺我朝”。秦日纲会见法使时，不给予平等的座位。太平天国地官丞相罗苾芬等责美使来文擅用“照会”形式，要求他“跪禀具奏”，然后“准尔年年进贡、岁岁来朝”。如此等等。这些——无论是上述态度的哪一方面，都反映出太平天国缺乏近代国家观念和国际知识的历史局限性。

太平天国向来访者表明了愿意通商和禁止出售鸦片的立场，但很少向对方提出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建议。双方在这几次外交接触中的交涉或争执都是偶然的、枝节的。对来访外国人提出的主要问题，太平天国却没有给予重视。对方申明他们早已同清政府订有条约，要求尊重他们的条约权利；太平天国没有明确表示态度。文翰等再三宣称愿在太平天国和清朝之间保守中立。当时，清朝官员正千方百计购求外国的武器装备援助，如果外国严守中立，对太平天国是有利的。但太平天国领袖对文翰等的这一姿态并未加以重视和利用。韦昌辉对密迪乐保证中立不助清朝的声明，只答以：“尔等如助满人，真是大错；但